

论思维模式差异视角下的文化调解人

蒋华应

(四川理工学院 外语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跨文化交际翻译对加快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其在世界文化之林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应牢牢把握思维模式差异性对民族语言差异性的重要影响及决定作用,熟谙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是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上的具体体现。为了切实履行好文化调解人的固有职责,译者应该对汉民族思维模式影响下的一些特殊汉语表达方式进行深入剖析,并合理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使译文能够真正地被异域文化接受,将“排异反应”降到最低值。这势必会给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注入新的活力,促进跨文化交际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思维模式差异;文化调解人;译者;跨文化交际;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2)03-0069-04

一、引言

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过去 20 多年中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那种把翻译看作是信息在语际间的简单转换的传统观念已经遭到了人们的摒弃。众多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致力于思维、语言和翻译三者间关系的研究,最后在把翻译作为涉及到原作者、译者和译入语读者三个方面的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上达成了共识。不同的实践活动,导致不同的思维过程。思维过程最终通过语言体现出来,同时会慢慢形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构成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种集体无意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传承性,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1]。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具有不同的方式或者说他们以不同的思维模式来反映客观世界。受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对于同一事物,他们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就给跨文化交际造成了障碍。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由于原作者和译入语读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思维模式,这就常常造成理解障碍和误读。这就需要作为文化调解人的

译者在处理由思维模式不同而造成的交际障碍时,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帮助译入语读者跨越文化障碍,从而获得对文本的正确解读。

如果译者能熟练掌握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上的体现,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汉英翻译提出一些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便能促进跨文化交际的纵深发展。张海涛曾就中英思维模式对翻译的影响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翻译过程中有三大重要因素,一是翻译客体(原作),二是翻译主体(译者),三是作用于主客体的翻译工具,而唯一能作用于翻译客体和翻译主体的,就是思维,思维是语言转换的基础,这就决定了语言的具体转换必然受到思维的限制^[2]。周志培指出思维是人类共有的,而思维模式则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这就是语际翻译的可能性基础^[3]。不同的语言都有其固有的特征,这就有碍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综上所述,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找出造成文化交流障碍的原因所在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使译者成为跨文化交际的“调解人”,无疑会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繁荣发展起到巨大

收稿日期:2012-04-05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资助项目(12SA045)

作者简介:蒋华应(1974-),男,四川安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网络出版时间:2012-4-19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20419.0004.001.html>

的推动作用。

二、身份的确立

纵观中西方翻译史,人们对于译者的身份有着不同的界定。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把译者界定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演说家”(ut orator);斯帕尔·德·田德认为译者是模拟原物的画家,他描绘模特儿的容貌,只模仿但不创新,一旦超出这一界限,译者就不再是译者,而变成了作者,变成了从事创作的人;法国杰出翻译理论家巴托根据译者的任务来把译者界定为原作的“仆人”^[4],他必须处处跟随作者,如实地反映原作者的思想和风格。

中国的翻译史可谓源远流长,然而鲜有提及译者身份。较早是在《周记》和《礼记》两书中有周王朝翻译官职的记载,《周记·秋官》:“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据《国语·周语》记载,周代译员又统称为“舌人”,即“……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会与之”^[5];后来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最为波澜壮阔之事,其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如安世高、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等。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翻译方法和技巧的言论和见解,但都鲜有涉及译者身份。

无论把译者称为“解释员”也好,还是“舌人”也罢,其本身职责仍然是通过自己的加工(即翻译)把源语的诸多信息最大限度地传递给译入语读者。而在这个加工过程中,一方面译者得极力贴近源文,另一方面,译者得极力迎合意向读者的要求;但无论如何,最后的成品(即译文)中或多或少都会留下译者的痕迹。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这种“奔跑”于源文和意向读者之间的译者正如日常生活中遇到双方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周旋于当事双方之间,最后促成双方达成协议的调解人。于此,不妨把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译者称为“文化调解人”。这样的称谓有利于提高译者的身份和地位,使其在读者面前不再是个“隐形人”,促使其更能充分发挥主体性,积极地投入到传播丰富多彩的源语文化当中来,使译文真正起到“调节”的作用,将两种文化合二为一,产生新的文化实体,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璀璨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语言,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对译者来说困难之处不在于语言,而在于依附在语言上的文化意蕴。

三、职责

当今翻译研究已经深刻意识到探究源文化产物与其在目的文化中的转换物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这就要求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在处理源文化产物并呈现他文化的过程中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这样翻译就成了两种不同文化冲击的代表。在此背景下,文化调解人(译者)的工作就显得异常重要。翻译,特别是跨文化交际翻译是一项不断接近他文化空间的活动,无论是从语言层还是符号层,我们对另一种文化的完全认识都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处于两种文化碰撞之夹缝中的文化调解人很难作出抉择。

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都不是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在不断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人们赋予了语言历史、政治、文化、民族等各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文化调解人不仅背负着这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他/她还必须在两种语言文化所构建的网络中绞尽脑汁地进行诠释和表述。于此,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的调解行为(翻译行为)就会受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强势或弱势意识、文本语言本身、主流意识形态对译文的期望、大众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力等因素的操控。

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译者首先要接受并尊重文化差异,并能清醒地认识到正是由于不同文化间难免的差异和冲突,才有了当今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如果翻译行为在两种不同的文化间进行,那么译者正是付诸这种行为的文化调解人。此时,译者必须保证它们在公平的条件下参与调解(翻译行为),并在实施调解的时候做到不偏不倚,更不能妥协于所谓的主流强势文化而肆意贬低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文化。如果调解人(译者)在调解过程中有失公允,缺乏对源语文化的尊重,对源文肆意处理或美化,那最后生成的调解书(译文)势必会加深两种文化的冲突,从而译者根本起不到调解人的作用,反而会让两种文化的“积怨”更深,而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也会处于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其次就是在面对两种迥异的文化的时候,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应该竭尽全力,灵活运用调解技巧,促使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协议书(译文)的生成。这份调解协议书就是 Wolf 眼中的“第三空间”^[6],这是两种文化的杂合^[7]。因为文化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系统,通过两种文化的杂合,源语文化得到了发扬和光大,而目的语文化也得到了充实和丰富。

四、面临的挑战

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英汉民族逐渐

形成了相同的判断、推理、演绎和归纳等能力。即,英汉民族有着相同的思维能力。但英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它们以不同的思维模式来反映客观世界。周志培指出,“思维是人类共有的,而语言则是民族性的。”由此,不妨大胆揣度,思维能力是人类共有的,而思维模式则是具有民族性的。

英汉民族思维模式的差异必然导致英汉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而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又反映着其固有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对语言具有重要影响,各民族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各民族固有的思维模式,如果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对由思维模式差异而引起的语言差异能够得以准确把握,这对他们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履行好调解文化冲突的职责是至关重要的。思维模式差异导致中英语言在表达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英语表达方式重抽象而汉语表达方式重具体;英语表达方式喜用“物”当句子的主语(无灵主语)而汉语喜用“人”当句子的主语(有灵主语)等等。

五、翻译策略

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翻译中,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应就不同的表达方式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促成中西文化的和谐交融,以发扬和光大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限于篇幅,笔者谨提出对上述三种不同表达方式的英译策略。

(一)汉语的意合性

在处理意合性汉语表达方式的时候,作为文化调节人的译者首要任务就是要分清句子中的主次成分、概念性前提,动作的承受者等。根据不同的句型,灵活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以传其言,达其义。汉语拥有大量的没有明显关系词的从属性复合从句,这样的句子表面看起来就像是并列从句,但认真分析后,其主句和从句部分的关系就跃然眼前了。在处理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常将其翻译为英语从句。如:人(若)不犯我,我(则)不犯人(We will not attack unless we are attacked)^[8];人到醉时方觉醒,醒时难得醉时清(It is not until ones gets drunk that he gets sober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him to get as sober as he gets drunk)^[9]。由上可以看出,英语从句的使用,使得译文语义更加连贯,行文也更加流畅。

(二)汉语的具体性

受具体性思维模式的影响,汉民族常用具体、形象的概念来表达抽象、虚幻的事物;然而英语民族习惯用表示概念的东西来对具体事物进行判断和推理,而不是借助于具体的实物。在跨文化翻译中,主要处理方法

就是借用英语抽象名词来替换汉语中的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如:袭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饽饽’了,都抢不到手”(曹雪芹、高鹗《红楼梦》);(His-jen and the others commented jokingly, “With her mistress ill she’s in such great demand, everyone’s trying to grab her”)(杨宪益、戴乃迭译)。又如:住在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人对于月亮的圆缺隐现是不关心的(叶圣陶《看月》);(People living in the small alleyways of Shanghai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waxing and waning, or the visibility of the moon)(张培基译)。经过这番替换以后,更能适合英人的表达方式,也更能被英人接受,已促使文化精髓的对外传播。

(三)汉语的有灵主语

传统的汉语思想认为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喜欢把自然人化或人自然化,崇尚“天人合一”。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以人生为本位,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的本体型思维方式^[10],这就逐步形成了主体思维模式。受该思维模式的影响,汉语句子常用“人”等有灵词语作为句子的主语。而英语民族则把自然放到人类的对立面,把自然作为人类认知的对象。他们认为,只有完全认识了自然,才能让自然为人类服务。受这种客体思维模式的影响,英语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无灵主语句。在处理这类表达方式的时候,往往使用英语无灵主语句来替换汉语中的有灵主语句,或采取重构英语主语的方法。如: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他这么不老实(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hat he was so dishonest)^[11]。在汉语句子中,主语是人物“我”,而在英语表达中,主语是表物的代词“it”,而真正的主语则是“that he was so dishonest”。又如: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You can sit tight in the fishing boat despite the rising wind and waves)^[12];原句中没有主语,通过在译文中增加主语“You”译者实现了对主语的重构,这样的译文才更加具有表达性,读后顿有身临其境之感。

六、结语

在这个多元文化并置、共存与整合的时代,对话无疑是异质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只有以平等、开放、宽容、坦诚的姿态进行交流与对话,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共同发展^[13]。在此时代背景下,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文化应当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而中华文化的传播于世则要依赖文化调解人(翻译者)艰辛劳动的不断推动。所以,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应当熟谙中英文化差异,准确把握由思维模式差异造成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

中,合理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履行好调解人的职责,最大限度地弥合不同语言难以直接沟通的缺憾,让读者感受到不同文化的美感^[4];把更多、更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经典介绍到英语文化中去,以使中华文明积淀能闻名于世、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 [1] 张辉.地理环境与英汉语言思维顺序差异考量[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0-104.
- [2] 张海涛.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中国翻译,1999,(1):21-23.
- [3] 周志培.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 [4]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5]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 [6] Simon, Sherry & Paul St-Pierre.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7] 余学勇.论译者作为文化调解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194-195.
- [8]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9] 邵志红.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 [10] 戴志霍.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20-124.
- [11] 朱章华.浅议语言结构、思维模式的哲学渊源及翻译[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72-78.
- [12] 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 [13] 王晓燕.跨文化交际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85-88.
- [14] 陈希洁.论翻译中的词意缺省现象[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61-62.

责任编辑:梁雁

The Culture Media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Thinking Patterns

JIANG Hua-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or the culture mediator should be acquainted with consequential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hinking patterns on native language. He/She should keep firmly in mind that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are produced by the different thinking patterns. Meanwhile conducting some meaningful discussion on some special Chinese expressions influenced by Chinese thinking patterns and employing some prope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translator will be able to better fulfill the duty of culture mediator and pump new life to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and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ould be growing vigorously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different thinking patterns; culture mediator; the translat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